

白话论衡

【东汉】王充·原著



古典名著今译读本

白话论衡

【东汉】王充 / 原著
陈建初
蒋骥骋 今译
张晓莺



岳麓书社

1998年/长沙

责任编辑：吴译顺
封面设计：许康铭

白话论衡

〔东汉〕王充原著

陈建初 蒋骥骋 张晓莺 今译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长沙市河西新民路）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印研所试验工厂印刷

1997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850,000 印张：35.375 印数：1—5,000

ISBN—80520—774—7
Z·26 定价：33.00元

湘新登字007号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出版科调换

社址：长沙市河西新民路 邮编：410006

前　　言

《论衡》，东汉王充（公元27—95）撰，全书八十四篇（标目八十五篇，其中一篇缺文），约共二十四万字左右。是我国古代思想哲学著作中最具批判精神和战斗力的作品之一。

王充，字仲任，会稽上虞（今浙江上虞）人，是生活在东汉前期的一个思想家。他出身“细族孤门”，祖父、父亲皆以商贾为业，曾因得罪豪门而举家迁徙。据《后汉书·王充传》记载，他年轻时到洛阳上太学，因“家贫无书，常游洛阳书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记，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后来回乡教过书，又在县、郡和州里做过功曹和从事等小官，终因“数谏争不合”而辞官。从此，王充在仕途上一蹶不振，虽在晚年时辗转于安徽一带做过一些时候的属官，但始终郁郁不得志，“仕路隔绝，志穷无如”（《自纪》）。当在朋友的推荐下，汉章帝征召他进京时，他已病老垂暮，不能前往了。在个人生活方面，他到晚年也是“俦伦弥索，鲜所恃赖，贫无供养，志不娱快”（《自纪》）。可见王充作为一个中下层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仕途上的不得志，生活上的不满足，造成了他思想性格上的一种叛逆倾向，这或许正是促使他向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正统思想和政治观念进行挑战的社会基础。

与此相一致的是，王充思想上的叛逆性格，在他的生活经历中，时时可见端倪。比如王充在《自纪》中，说他的祖辈“勇任气”，“怨仇众多”，“卒咸不揆于人”，所以到祖父王汎时只能举家迁徙。而到了他的父辈则“滋甚”（更加厉害），在地方上“勇势凌

人”，最后又因与豪家结怨而不得不再次迁徙。王充敢于这样用批判的口吻揭祖宗的“短”，这本身就是一种叛逆。又据王充《自纪》，他小时候与伙伴们在一起时，“不好狎侮”。小伙伴们喜欢玩“掩雀、捕蝉、戏钱”等，而王充“独不肯”。王充读书，也是“好博览而不守章句”（《后汉书·王充传》），“淫读古书，甘闻异言”，所以能指出“世书俗说，多所不安”（《自纪》），“俗儒守文，多失其意”（《后汉书·王充传》）。至于王充做官，就是因为“不好徼名于世，不为利害见将”的清高，“众会乎坐，不问不言；赐见君将，不及不对”的孤傲，以及“数谏争不合”的特立，而至于“仕数不耦”（《自纪》）的。从这些方面可以看出，王充是一个善于独立思考而不人云亦云的人。再加上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社会科技水平有了长足的进步，“博通众流百家之言”的王充，自然能吸取先进的思想成果，从而对种种正统的思想观念提出批判和质疑，并提出一系列闪烁着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火花的见解。

据王充《自纪》，他是在家乡的州、郡作属官时，就因看到“世书俗说，多所不安”而开始“幽处独居，考论实虚”的，其时盖年轻。后来在“废退穷居，旧故叛去”之时，为了“志俗人之寡恩”而“闲居作《讥俗》、《节义》十二篇”。后来“又闵人君之政徒欲治人，不得其宜，不晓其务，……故作《政务》之书。”“又伤伪书俗文多不实诚，故为《论衡》之书。”这些篇章应该是王充再次辗转于安徽一带为官时所作，其年已在六十岁左右。到了汉章帝章和二年（公元88年），王充“罢州家居”，又作了《养性》书凡十六篇，此时已“年渐七十”。最后，王充为了“垂书示后”，才将历年所写的书文编成新书，统名之《论衡》，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本书。可见今本《论衡》八十四篇，应该基本包括了上述各书的篇目和内容，那么此书的写作，从“幽处独居，考论实虚”开始，一直到最

后整理完成，经历的时间应在三十年左右，足足花费了作者半生的心血！

《论衡》之作，“上自黄、唐，下臻秦、汉而来，折衷以圣道，析理于通材，如衡之平，如鉴之开，幼老生死古今，罔不详该。”（《自纪》）作者举起了批判的旗帜和击刺的长矛，“谈天”“说日”，“订鬼”“纪妖”，“难岁”“诘术”，用朴实的唯物主义观点解释了许多当时被蒙上神秘色彩的自然现象，鲜明地批判了唯心主义的神学思想体系和汉代流行的谶纬迷信。作者还讨论了“命义”、“本性”以及祸福、符瑞等问题，坚决地否定了君权神授、天人感应等唯心主义观点。特别难能可贵的是，王充在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封建社会时期，敢于把矛头对准孔子等“圣人”，他作《语增》、《儒增》、《艺增》等篇，“问孔”“刺孟”“非韩”，用大量的事例，破除了“圣贤所言皆无非”、“神而先知”的迷信，除去了罩在圣人头上的耀眼光环。他公开地宣言：“苟有不晓解之问，追难孔子，何伤于义？诚有传圣业之知，伐孔子之说，何逆于理？”（《问孔》）这一宣言的意义，我们认为不在于王充究竟批判了孔、孟儒学的什么观点或错误（王充并不否定儒学及孔子），也不在于其批判的正确与否或力度如何，而在于其惊世骇俗的批判精神本身。

总之，《论衡》的内容丰富深刻，不仅涉及到哲学思想，还论及政治、宗教、自然科学与文化诸方面。在立论方面，王充自己说过：“《论衡》者，论之平也。”（《自纪》）“《论衡》之造也，起众书并失实，虚妄之言胜真美也。……故《论衡》者，所以铨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非苟调文饰辞，为奇伟之观也。”（《对作》）本书的思想观点（也可包括语言），大抵如其自言，平实而真。当然，时代的束缚和立场的局限，不可避免会反映在字里行间。这些我们在此不必细述，原书具在，译文可寻，读者诸君自可明察。

本书虽为“白话论衡”，但我们仍附上原文。这是因为《论衡》成书以后，由于其“异端”性而埋没近百年才得以面世，在长期的传写梓刻中，衍脱错互之处为数不少。附上校勘后的原文，可方便读者阅读了解。

本书所附原文，以中华书局重印《诸子集成》本为底本，重新分段、标点，并参考多种版本及校点、注释本，以校正文字。依古籍校勘的惯例，凡衍文、误字均加圆括号表示删去，凡脱字、正字均加方括号表示增补，方括号置圆括号之后。例如：建初四年夏六月，雷击（杀）会稽（靳专日食）〔鄞县〕羊五头，皆死。（《雷虚》）限于本书体例，不加注解，不出校记，故采用前人时贤成说之处，不能一一示明。

本书译文力求忠实原著，以“信”为重，以直译、对译为主。因为我们想到古籍今译不仅仅是为社会一般读者提供一种古籍白话读本，也要同时为有志学习古代汉语和研究古代文献的人提供一种参考资料。本书的翻译也参考了一些注释书，难译之处，亦广为采撷，参以己意，力求稳妥。

本书的翻译是由陈建初、蒋冀骋、张晓莺三人集体完成的。除集体讨论有关的体例、原则外，即分工负责各篇的翻译。其中张晓莺负责《变动》到《论死》（共十九篇），蒋冀骋负责《死伪》到《自纪》（共二十三篇），陈建初负责《逢遇》到《谴告》（共四十二篇）。

《论衡》一书的研究和文字校释都远不能说已经完善，加上译者的学力亦有所不及，所以，本书的译文必定存在着有违原著的错误之处，敬祈广大读者同仁拨正。

陈建初

一九九七年三月

目 录

前 言	(1)
逢遇篇	(1)
累害篇	(10)
命禄篇	(18)
气寿篇	(26)
幸偶篇	(31)
命义篇	(37)
无形篇	(46)
率性篇	(54)
吉验篇	(65)
偶会篇	(75)
骨相篇	(84)
初稟篇	(97)
本性篇	(102)
物势篇	(112)
奇怪篇	(119)
书虚篇	(128)
变虚篇	(152)
异虚篇	(163)
感虚篇	(175)
福虚篇	(200)
祸虚篇	(210)
龙虚篇	(220)
雷虚篇	(230)
道虚篇	(248)
语增篇	(273)
儒增篇	(288)
艺增篇	(306)
问孔篇	(317)
非韩篇	(352)
刺孟篇	(371)
谈天篇	(390)
说日篇	(400)
答佞篇	(428)
程材篇	(443)
量知篇	(456)
谢短篇	(465)
效力篇	(476)
别通篇	(488)

超奇篇	(502)	死伪篇	(785)
状留篇	(514)	纪妖篇	(812)
寒温篇	(522)	订鬼篇	(835)
谴告篇	(531)	言毒篇	(850)
变动篇	(544)	薄葬篇	(858)
招致篇(缺)	(556)	四讳篇	(868)
明雩篇	(556)	诇时篇	(884)
顺鼓篇	(571)	讥日篇	(892)
乱龙篇	(583)	卜筮篇	(904)
遭虎篇	(593)	辨祟篇	(916)
商虫篇	(600)	难岁篇	(925)
讲瑞篇	(608)	诘术篇	(935)
指瑞篇	(629)	解除篇	(946)
是应篇	(642)	祀义篇	(955)
治期篇	(655)	祭意篇	(966)
自然篇	(665)	实知篇	(977)
感类篇	(682)	知实篇	(997)
齐世篇	(699)	定贤篇	(1019)
宣汉篇	(713)	正说篇	(1050)
恢国篇	(724)	书解篇	(1067)
验符篇	(737)	案书篇	(1079)
须颂篇	(745)	对作篇	(1090)
佚文篇	(757)	自纪篇	(1101)
论死篇	(768)		

逢遇篇

【原文】 操行有常贤，仕宦无常遇。贤不贤，才也；遇不遇，时也；才高行洁，不可保以必尊贵；能薄操浊，不可保以必卑贱。或高才洁行，不遇，退在下流；薄能浊操，遇，在众上；世各自有以取士，士亦各自得以进。进在遇，退在不遇。处尊居显，未必贤，遇也；位卑在下，未必愚，不遇也。故遇，或抱洿行，尊于桀之朝；不遇，或持洁节，卑于尧之廷。所以遇不遇非一也：或时贤而辅恶；或以大才从于小才；或俱大才，道有清浊；或无道德，而以技合；或无技能，而以色幸。

【译文】 操行有一贯贤良的，而做官却没有总是受赏识被重用的。贤不贤良，是个人才质的问题；被不被重用，是时运的问题。才能高超，品行明洁，不能保证一定尊贵；才能低下，品行污浊，也不一定就会卑贱。有的人才能高超品行明洁却不被赏识，处在低下的地位；有的人才能低下品行污浊却被重用，居于众人之上。各个时代自有用来选拔士人的标准，士人也各自有用来进身居官的方法。进身居官在于受赏识，摒退落第在于不受赏识。处在尊贵显要的地位，未必就贤良，而是因为受赏识；地位卑贱低下，未必就愚劣，而是因为不受赏识。所以，只要受赏识，具有污浊操行的人也能在夏桀的朝廷上显贵起来；如果不受赏识，具有高洁节操的人也会在尧的朝廷中位居卑贱。被赏识重用与不被赏识重用的原因并不是一样的：有的是当世的贤人却辅佐了暴

君；有的是大才却跟着才能低下的君主；有的都是大才但道德有清浊之分；有的没有道德，却以一技之长迎合了君主；有的没有技能，而凭姿色受到君主的宠幸。

【原文】 伍员、帛喜，俱事夫差，帛喜尊重，伍员诛死，此异操而同主也。或操同而主异，亦有遇不遇，伊尹、箕子是也。伊尹、箕子才俱也，伊尹为相，箕子为奴，伊尹遇成汤，箕子遇商纣也。夫以贤事贤君，君欲为治，臣以贤才辅之，趋舍偶合，其遇固宜。以贤事恶君，君不欲为治，臣以忠行佐之，操志乖忤，不遇固宜。

【译文】 伍员、帛喜一块事奉夫差，帛喜地位尊贵权势显赫，伍员却被处死，这是操行不同的人事奉同一个君主的情况。有的操行相同而事奉的君主不同，也有被赏识重用与不被赏识重用的差别，伊尹、箕子就是这样的。伊尹和箕子才能一样，而伊尹做了国相，箕子成了奴隶，是因为伊尹碰上了成汤王而箕子碰上了商纣王。凭着贤良的才能事奉贤君，君主想把国家治理好，臣下以贤才辅佐他，进取与舍弃都互相一致，他的被赏识重用是理所当然的；凭着贤良的才能事奉暴君，君主并不想把国家治理好，而臣下用尽心尽力的作法去辅助他，操行与志趣都不合，不被赏识重用也是理所当然的。

【原文】 或以贤圣之臣，遭欲为治之君，而终有不遇，孔子、孟轲是也。孔子绝粮陈、蔡，孟轲困于齐、梁，非时君主不用善也，才下知浅，不能用大才也。夫能御骥騄者，必王良也；能臣禹、稷、皋陶者，必尧、舜也。御百里之手，而以调千里之足，必有摧衡折轭之患；有接具臣之才，而以御大臣之知，必有闭心塞意之变。故至言

弃捐，圣贤距逆，非憎圣贤，不甘至言也，圣贤务高，至言难行也。夫以大才干小才，小才不能受，不遇固宜。

【译文】有的作为贤良睿智的臣子，碰上想要治理好国家的君主，但最终又不被赏识重用，孔子、孟轲就是这样的。孔子在陈国到蔡国的途中断了粮，孟轲在齐国和魏国陷于困境，并非当时的君主不任用贤人，而是由于才智浅薄，不善于使用人才。能够驾驭千里马的人，一定是王良那样的能手；能够把禹、稷、皋陶作为臣下的，一定是尧、舜那样的贤君。只能驾驭百里马的驭手，却用他驾驭千里马，必定有毁坏车子的祸患；只有使用备位充数之臣的才能，却让他驾驭具有大臣才智的人，一定会发生禁固思想、压抑才智的不正常现象。所以非常高明的意见被抛弃，睿智仁惠的贤人被排斥，并不是憎恶圣贤，不喜欢听高明的意见，而是圣贤追求太高，高明的意见难以实行。作为大才而求小才重用他，小才不能接受，那么大才不被赏识重用是理所当然的。

【原文】以大才之臣，遇大才之主，乃有遇不遇，虞舜、许由，太公、伯夷是也。虞舜、许由俱圣人也，并生唐世，俱善于尧，虞舜绍帝统，许由入山林。太公、伯夷俱贤也，并出周国，皆见武王，太公受封，伯夷饿死。夫贤圣道同、志合、趋齐，虞舜、太公行耦。许由、伯夷操违者，生非其世，出非其时也。道虽同，同中有异；志虽合，合中有离。何则？道有精粗，志有清浊也。许由，皇者之辅也，生于帝者之时；伯夷，帝者之佐也，出于王者之世，并由道德，俱发仁义。主行道德，不清不留；主为仁义，不高不止，此其所以不遇也。尧混舜浊；武王诛残，太公讨暴，同浊皆粗，举措钩齐，此其所以为遇者也。故舜王天下，皋陶佐政，北人无择深隐不见；禹王天

下，伯益辅治，伯成子高委位而耕。非皋陶才愈无择，伯益能出子高也。然而皋陶、伯益进用，无择、子高退隐，进用行耦，退隐操违也。退隐势异，身虽屈，不愿进；人主不须其言，废之，意亦不恨，是两不相慕也。

【译文】作为大才一类的臣子，碰上有大才的君主，还是有被不被赏识重用的问题，虞舜、许由、太公、伯夷就是这样。虞舜、许由都是圣人，同时生活在唐尧的时代，都在尧的面前，而虞舜继承了帝位，许由躲进了山林。太公、伯夷都是贤人，同时出生在周国，都面见武王，而太公受封土地，伯夷饿死首阳山。圣人贤人道相同，志相合，进取一致，虞舜、太公操行与尧帝、武王相符。而许由、伯夷操行与尧帝、武王相违背，是因为他们并非生长在那样的社会，并非处在那样的时代。道虽然相同，但同中有异；志虽然相合，但合中有离。为什么呢？因为道有精深粗浅而志有高尚低俗。许由，是上古“皇者”的辅佐之才，却生长在“帝者”的时代；伯夷，是“帝者”的辅佐之才，却处在“王者”的时代。他们都遵循道德，都实行仁义。君主施行德政，如果不非常清明就不肯留下来辅佐；君主施行仁义，如果不特别高尚也不愿意留下来佐助，这就是他们不受赏识重用的原因。尧帝污浊，虞舜也不清明；武王要讨伐残暴，太公也要讨伐残暴，同样污浊同样粗浅，举措都一致，这就是他们被赏识被重用的原因。所以舜统治天下，皋陶便辅佐政务，北人无择却深深隐藏不愿露面；禹统治天下，伯益就辅佐治理，伯成子高却丢掉官位去耕田。并不是皋陶的才智胜过北人无择，伯益的能力超过伯成子高，但是皋陶、伯益升官重用，无择、子高退位归隐，是因为升官重用的操行与君相合，退位归隐的操行与君主相违。退位归隐权势已异，自己虽然委屈，也不

愿意再进身做官；君主则并不指望他来进言，不任用他，心里也不遗憾，这是双方互不在意啊！

【原文】商鞅三说秦孝公，前二说不听，后一说用者，前二，帝王之论；后一，霸者之议也。夫持帝王之论，说霸者之主，虽精见距；更调霸说，虽粗见受。何则？精，遇孝公所不得；粗，遇孝公所欲行也。故说者不在善，在所说者善之，才不待贤，在所事者贤之。马圉之说无方，而野人说之；子贡之说有义，野人不听。吹籁工为善声，因越王不喜，更为野声，越王大说。故为善于不欲得善之主，虽善不见爱；为不善于欲得不善之主，虽不善不见憎。此以曲伎合，合则遇，不合则不遇。

【译文】商鞅三次游说秦孝公，前两次不被采纳，后一次被采纳了，是因为前两次说的是关于“帝者”、“王者”的道理，后一次说的是关于“霸者”的道理。拿关于“帝者”、“王者”的道理，去说服只想成为“霸者”的君主，虽然精辟也被拒绝；改用关于“霸者”的理论去劝说，虽然粗浅也被采纳。什么原因？因为虽然精辟，但碰上秦孝公不喜欢；虽然粗浅，却正碰上秦孝公想要那样实行。所以劝说的不在于好不好，而在于被劝说的人认为它好；才能不需要怎么高明，而在于被事奉的人认为他高明。马信的话并无多少大道理，但农夫喜欢它；子贡的话很有合乎义的大道理，但农夫不听。吹籁的人擅长吹奏美妙的声音，因为越王不高兴，改为吹奏乡野小调，越王非常高兴。所以为不想得到好东西的君主创造好的东西，即使再好也不被喜爱；而在不想得到好东西的君主面前做些不好的事，即使再不好也不会被憎恶。这就是凭着些小技去投合君主，相合则被赏识重用，不合则不被赏识重用。

【原文】或无伎，妄以奸巧合上志，亦有以遇者，窃簪之臣，鸡鸣之客是也。窃簪之臣，亲于子反。鸡鸣之客，幸于孟尝。子反好偷臣，孟尝爱伪客也。以有补于人君，人君赖之，其遇固宜。或无补益，为上所好，籍孺、邓通是也。籍孺幸于孝惠，邓通爱于孝文，无细简之才，微簿之能，偶以形佳骨媚，皮媚色称。夫好容，人所好也，其遇固宜。或以丑面恶色称媚于上，嫫母、无盐是也。嫫母进于黄帝，无盐纳于齐王。故贤不肖可豫知，遇难先图。何则？人主好恶无常，人臣所进无豫，偶合为是，适可为上。进者未必贤，退者未必愚，合幸得进，不幸失之。

【译文】有的人并无什么小技，胡乱地以邪门歪道去迎合君主和上司的心意，也有因此被赏识重用的人，像偷簪子的臣子，学鸡叫的食客之类就是这样的。偷盗簪子的臣子被子反所亲近，学鸡叫的食客被孟尝君所宠爱，是因为子反喜爱偷盗的臣下，而孟尝君喜欢弄虚作假的食客。因为对君主有益，君主依赖他们，他们被赏识重用本是理所当然。有的对君主并无补益，却被君主所喜爱，籍孺、邓通就是这样。籍孺被孝惠帝所宠爱，邓通被孝文帝所宠爱，他们连细微浅薄的才能都没有，只是因为体态优美、脸面可爱而博得君主的欢心。美好的容貌，是人们所喜欢的，他们受赏识也就本属当然。有的人则凭丑陋的面容、难看的姿色而博得君主的赞赏喜爱，嫫母、无盐就是这样。嫫母被黄帝选为妃子，无盐被齐王纳为王后。所以，贤能或不贤还可以预先知道，受赏识重用则难以事先谋求。什么原因呢？因为君主好恶无常，臣下该进献什么却无法预知，只有碰巧投合是对的，恰到好处为上策。升迁的不一定贤能，摒退的不一定愚劣，符合君主心意则侥

幸得到升迁，不符合则失去升迁的幸运。

【原文】世俗之议曰：“贤人可遇，不遇，亦自其咎也。生而希世准主，观鉴治内，调能定说，审司际会，能进有补贍主，何不遇之有？今则不然，作无益之能，纳无补之说，以夏进炉，以冬奏扇，为所不欲得之事，献所不欲闻之语，其不遇祸幸矣，何福祐之有乎？”进能有益，纳说有补，人之所知也。或以不补而得祐，或以有益而获罪。且夏时炉以炙湿，冬时扇以爨火。世可希，主不可准也；说可转，能不可易也。世主好文，己为文则遇；主好武，己则不遇。主好辩，有口则遇；主不好辩，己则不遇。文主不好武，武主不好文；辩主不好行，行主不好辩。文与言，尚可暴习；行与能，不可卒成。学不宿习，无以明名。名不素著，无以遇主。仓猝之业，须臾之名，日力不足，不预闻，何以准主而纳其说，进身而托其能哉？

【译文】世人的一般见解是：“贤人应该受赏识重用，不被赏识重用，也是由于他的过错。读书人如果能看清社会形势，摸准君主意图，参照国内的治理情况，调整自己的专长，确定自己的主张，周密窥测时机，进献对君主有所补益的东西，有什么不被赏识重用的呢？现在却不是这样，学些无益的技能，接受些无用的主张，在夏天进献火炉，在冬天进献扇子，做些君主所不想要的事，讲些君主所不愿听的话，他们没有遭到祸难已属幸运，怎么会有福运呢？”贡献技能要有益，提出建议要有帮助，这是人们都懂的道理。但有人用无益的东西得福，有人用有益的东西却获罪。况且夏天火炉可用来烘烤潮湿的东西，冬天扇子可用来扇火。社会形势可以看清，君主却难以摸准；意见建议可以变，技能

却难以改变。当时的君主好文，自己从事文就能受赏识；君主如果好武，那自己从事文就不会被赏识了。君主好辩，那么有口才就会受赏识；君主不好辩，那么有口才也不会被赏识。好文的君主不好武，好武的君主不好文；好辩的君主不重视品行，重视品行的君主不好辩。文章和说话，还可以快速学习；品行与才能，就不可能速成。学问不长期练习，没办法出名；名望不一向显著，没办法被君主重用。短期的学业，一时的名望，时间功力都不够，如果不事先使君主了解自己，根据什么摸准君主的意图而进献自己的主张，从而使自己受到任用并贡献自己的才能呢？

【原文】昔周人有仕数不遇，年老白首，泣涕于涂者。人或问之：“何为泣乎？”对曰：“吾仕数不遇，自伤年老失时，是以泣也。”人曰：“仕奈何不一遇也？”对曰：“吾年少之时，学为文。文德成就，始欲仕宦，人君好用老。用老主亡，后主又用武，吾更为武。武节始就，武主又亡。少主始立，好用少年，吾年又老。是以未尝一遇。”仕宦有时，不可求也。夫希世准主，尚不可为，况节高志妙，不为利动，性定质成，不为主顾者乎？

【译文】从前周朝有个人想做官而屡次没有被任用，年纪老了头都白了，在路边哭泣流泪。有人问他：“为什么哭呢？”他回答说：“我求官屡次不被任用，伤心自己年老不行时了，所以哭泣。”那人又问：“求官为何一次都不被任用呢？”回答道：“我年轻的时候学习从文，文章道德学成了，刚想要做官，君主却喜欢任用老年人。爱任用老年人的君主死了，继位的君主又要任用懂武的，我改而学武。武艺武德刚刚学成，任用懂武之人的君主又死了。年少的君主刚即位，爱用年轻的人，而我的年纪又老了，因此不